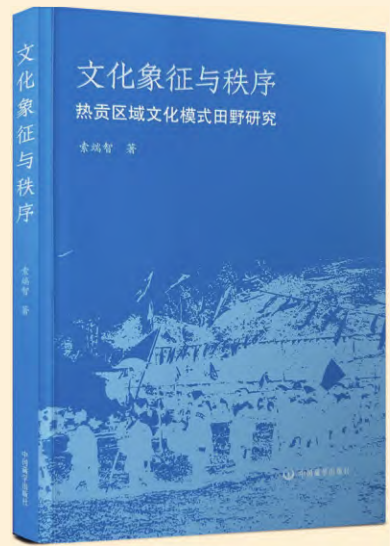


《文化象征与秩序：热贡区域文化模式田野研究》评介

□ 李元元

克里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曾有一段关于文化的著名表述：文化是一种“意义之网”；只有沉浸于特定的文化脉络中，个体或群体行动的动机、逻辑和过程才能被明晰地理解和把握。就此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根基和底座——不但赋予了人们生活的意义，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但从学术研究维度而言，文化又是一个极难被阐释和捕捉的对象。据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罗孔统计，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近80年时间里，有关文化的定义就多达164种。换言之，文化所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流动性和变迁性特质，使得任何有关特定文化模式的深入研究都注定是一趟充满坎坷和艰辛的“学术探险”。如何在本



体层面定义文化？如何在方法层面对文化进行“深描”？如何在功能层面准确阐释文化与社会结构、生活样态和历史进程的相关性？这些问题一度成为横亘于研究者面前的巨大障碍。令人兴奋的是，索端智教授新作《文化象征与秩序：热贡区域文化模式田野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23年8月第1版，以下简称《文化象征与秩序》）一书以扎实的田野工作为基础，结合经典理论范式，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民族志回应，以此为当前区域文化的研究生产了足够分量的“学术增量”。与同类型作品相比，《文化象征与秩序》一书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明显的突破性意义。

其一，该书以丰富的民族志材料对热贡文化进行了“全景”式深描，彰显了人类学整体观的学术关照。既有关于热贡文化研究多数偏重于对艺术、民俗、宗教等特定文化事项的探索，这种研究取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精准而深入地呈现了热贡区域文化的某个“横截面”，但“在商言商”式的片段研究却遮蔽了这一极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的整体面貌。与之相反，该书在人类学整体观的学术视野下，对热贡文化模式的产生历史、发展沿革、结构功能进行了全景式再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没有停留于对文化模式一味的宏大叙事，而对嵌入于这一意义之网中的社会生活图景进行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深描，彰显了人类学研究的独有“灵韵”。概言之，该书以“解剖麻雀”的手法对热贡文化进行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完整性呈现”，将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带回文化研究，向读者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而又令人向往的“他者的世界”，既彰显了人类学独有的整体观视角，也有助于人们破除基于某种“文化碎片”而形成的对藏族社会生活的“文化想象”，具有显而易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二，该书在具体阐释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弥合了“结构”与“历史”的鸿沟，对于国内人类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借鉴意义。有关人类学研究中“结构”与“历史”的鸿沟，（下转封三）

(上接封二) 萨林斯曾在《历史之岛》中有过专门的讨论。萨林斯写道,“实践拥有自己的动力学——一种并接结构——它会富有意义地界定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人与物。而这些场域性价值,假如它们与文化界定迥然不同的话,就具有反作用于传统价值的能力。”借助于夏威夷历史上著名的库克船长案例,萨林斯意在强调历史过程中关键事件所引发的实践情境的改变对当下文化结构的重要影响。但遗憾的是,当前多数有关区域文化的研究,都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历史对结构的影响,偏重于在现实中确定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化象征与秩序》一书突破了既有桎梏,用大量篇幅将热贡地区社会史引入对文化模式的研究,通过翔实的史料呈现了这一区域宗教变换的历史及其对当下热贡文化模式的影响,这一点在国内相关论著中并不多见。在该书中的阐释中,历史绝不仅仅是当下文化结构的隐形背景,同时也直接影响和形塑了当前文化结构和文化秩序的形成。就这一角度而言,该书为后续文化研究确立了一种范本,即如何将区域历史融入对当前文化结构的研究,从而具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

其三,该书对热贡文化的结构和功能进行了精准的类型学划分,有助于对这一区域文化的深入理解和阐释。在马凌诺夫斯基有关文化功能论的经典表述中,文化毫无疑问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文化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发挥着巨大功能。但如何去甄别文化结构中不同要素对应的不同功能?《文化象征与秩序》一书以热贡区域文化模式为样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精彩阐释。作者精准地区分了佛教信仰与守护神信仰——佛教信仰以政治—意识形态的正统性、生命轮回和因果报应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成为藏族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守护神信仰则以其与本土社会密切的互构性和悠久的历史传承,构成形塑藏族人民世俗生活的重要力量。在这一类型学区分的基础上,该书继而指出,佛教信仰赋予人们对来世和轮回的终极想象;守护神信仰则扮演了解决世俗世界中具体社会问题的功能性角色。这种对区域文化结构与功能的类型学划分,一方面深化了读者对藏族文化模式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为后续区域文化研究提供一种解读文化的新思路。此外,该书通过对区域文化的深描,展示了文化与社会伦理、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密相关性,一定程度上破除了有关学科关于经济样态、政治权力对社会结构具有排他性影响的学术迷思,重现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功能和意义,对于以文化研究为灵魂和根本的人类学学科而言,无疑是一次“正名”之旅。

综上所述,作为一项典型的人类学文化民族志研究,《文化象征与秩序》一书在研究视野、方法论运用和具体观点上均显示了独特的学术品位和价值,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区域文化研究典范之作,值得更多的读者细细品味和鉴赏。

作者简介:李元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与农村社会学。